



收藏文章



阅读量[61]



再论《沧浪诗话》的理论体系——兼答钟厚涛先生

朱志荣

内容提要 钟厚涛先生对《沧浪诗话》理论体系否定的角度和方法等是不成立的。严羽“说江西诗病”不是《沧浪诗话》的逻辑起点，而只是重要论据之一，“说江西诗病”并不代表要对“江西诗论”全盘否定，不能以《沧浪诗话》反“江西诗派”不彻底为依据，来否定《沧浪诗话》的体系。而“以禅喻诗”只是《沧浪诗话》诗论的论证方法之一，不能以比喻中的瑕疵来否认《沧浪诗话》的体系。《沧浪诗话》中的复古继承了复古创新的优良传统，对矫正时弊起着积极作用。因此，钟文抨击《沧浪诗话》的三方面，“立论动因的消解”、“言说策略的失效”和“批评后效的落空”，都不能说明《沧浪诗话》不具备体系，何况这种批评本身存在着逻辑上的混乱。《沧浪诗话》的体系是客观存在的。

关键词 沧浪诗话 理论体系 江西诗病 以禅喻诗

对严羽《沧浪诗话》的批评，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，其中尤以清代学者冯班为烈，但这些批评意见并没有削弱《沧浪诗话》的影响力。当代许多学者认为《沧浪诗话》是有体系或系统的，但一般只是一笔带过，我的论文《论〈沧浪诗话〉的理论体系》^[1]具体论证了《沧浪诗话》理论体系的内容及其特点。最近读了钟厚涛先生的论文《〈沧浪诗话〉“体系性”问题再审视——兼向朱志荣教授请教》^[2]之后，有一定的启发，同时我感到这篇文章主要不是针对我的论文，而是立足于否定《沧浪诗话》体系的。钟文所指出的《沧浪诗话》的诸多缺陷，早已有人论及，而《沧浪诗话》的理论缺陷与《沧浪诗话》的体系是否存在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。我认为钟厚涛否定严羽理论体系的角度和方法等是不成立的，特申述如下，请钟厚涛先生和学界同仁批评指正。

一 “说江西诗病”辩

钟厚涛把“说江西诗病”说成是严羽《沧浪诗话》的立论动因，认为其立论动因在其后的具体论述中被彻底地消解了，以此判断《沧浪诗话》体系不存在。这显然是一种误解。严羽在《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》中自诩说“其间说江西诗病，真取心肝刽子手。”这说明严羽诗话的“立论动因”之一即在于“说江西诗病”。但“说江西诗病”不是《沧浪诗话》的逻辑起

周访问排行 月访问排行 总访问排行

- 鲁迅和许广平犯有“通奸”罪吗？
- 现实主义还是色情主义？
- “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”了吗？
- 不要把张爱玲和胡兰成混为一谈
- 论中西文人女性人体描写的审美特征...
- 文学如何向现实“说话”
- 新诗创世何劳胡适尝试
- 当代文学的若干问号
- 期待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
- 暧昧的“民间”：“断裂问卷”与90...

网友评论 [更多评论](#)

如果您已经注册并经审核成为“中国文学网”会员，请 [登录](#) 后发表评论；或者您现在 [注册成为新会员](#)？

诸位网友，敬请谨慎网上言行，切莫对他人造成伤害。

验证码:

点，而只是重要论据之一。《沧浪诗话》是否有体系，在于它的逻辑起点，而不是立论动因。逻辑起点和立论动因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。严羽作《沧浪诗话》的立论动因是“说江西诗病”，逻辑起点是“诗者，吟咏情性者也”。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，不能混为一谈，而由此在逻辑上推论说《沧浪诗话》的体系是不成立的，更是违反基本逻辑常识的。

建立理论体系是建设性的工作，并不是要针对谁。以“立论动因”来说明体系是否存在，是以针对性规定体系性的做法。钟文认为：“任何一方理论体系的构建，必定会有其立论的动因所在，也即要有明确的针对性。”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。构建理论体系并不必然地是批判，并不需要批评或打倒特定的对象，可以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发展，可以是集大成式的，不一定要针对江西诗派。严羽这种有认同、有批评的做法，恰恰是客观的，实事求是的，超越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。因此，体系是建设性的，建立体系未必要有针对性，不是为了批判谁而建立体系的，更不是要把批判进行到底才建立体系的。严羽《沧浪诗话》体系的特色在于它不同于正统的儒家诗教观，而强调妙悟和性灵。

严羽对江西诗派有继承，有批判，有发展，但这并不影响他思想的体系性。钟厚涛以严羽既批判又继承江西诗派主张而否定《沧浪诗话》的体系性，是于理不通的。严羽肯定批评了江西诗病，他对江西诗派的诗学主张烂熟于胸，深知其根底，知道江西诗派诗学主张的“死穴”所在。而在钟文的论述中，严羽所说的“说江西诗病”被作者直接改换成“直接攻讦和反对江西诗派的诗学主张”。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思维方式，没有尊重严羽的观点，“诗病”和“诗学主张”毕竟还是两回事。而且即使“说江西诗病”也并非是要完全否定和排斥江西诗派，批判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展。

严羽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了江西诗派的某些诗学主张，不能说明《沧浪诗话》自己就是没有体系的。任何一种学说或者理论体系都不是凭空而来的，都是建构者在继承前人理论的优点、改正其缺点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而诞生的，《沧浪诗话》也是这样。如果因为《沧浪诗话》继承了江西诗派的某些主张，就得出“《沧浪诗话》出现了难以弥合的缝隙”、并“彻底地消解掉了”其理论体系的结论，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，也不符合理论、学说发展的实际情况。严羽对待江西诗派的总体态度是客观公允的，是继承与批评的辩证统一，其中在诗论上更多地作了继承和发展，而在诗歌实践方面则更多地给予了批评。关于严羽对江西诗派的继承和发展，我在《文艺理论研究》2007年第5期上发表的《论江西诗派对严羽〈沧浪诗话〉的影响》一文中有详细论证。这种继承和发展，使得他的《沧浪诗话》比江西诗派的诗论更完善，更有价值，也更有体系性了。这是学者在《沧浪诗话》体系性问题上应该采取的科学态度。

因此，严羽不是钟厚涛所说的那种简单地“回到和认同了江西诗派的诗学主张”。用刘勰的话说，乃是：“有同乎旧谈者，非雷同也，势自不可异也；有异乎前论者，非苟异也，理自不可同也。”这是体大思精的《文心雕

龙》的作者刘勰的态度，也是建立诗论体系的严羽的态度。严羽批评江西诗派，又吸取了江西诗论的精华，说明严羽的态度是辩证的、客观的，并没有因为要批评一个诗派而将其全盘抹杀。南宋的著名诗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江西诗派的影响，曾几、陆游、杨万里、姜夔等人都是从“江西”入，最后又能开创出新的诗风，只不过他们是从诗歌创作上表现出来，而严羽是从诗歌理论上表现出来而已，其精神实质是一样的。严羽批判江西诗派的眼光说明他能跳出江西诗派的框架，既看到其优点，又不回避其缺点。

二 “以禅喻诗”辩

钟厚涛认为“以禅喻诗”是批评策略，严羽并不因为使用了“以禅喻诗”的策略就建立了自己的诗学体系，策略和体系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，策略能否建立体系关键还要看建构者本身的素质。同时，严羽在建立自己的诗学体系的时候，他的“言说策略”并不仅仅是“以禅喻诗”，同时他还使用了“以兵法论诗”、历史推原等手段，他的诗学方法论本身具有强烈的辩证意识和现实针对性。因此，如果仅仅以“以禅喻诗”本身所具有的某些不足而否定严羽的诗学体系，这实际上也是对严羽及其《沧浪诗话》的有意误解，是一种不顾文本本身的片面、盲目的批评。

严羽虽然对禅学了解不够，但这并不影响他运用“以禅喻诗”的方法来进行批评，更不直接影响严羽的诗学体系。钟厚涛说严羽对禅宗“一知半解”，这是过去流行的一种说法，是一种人云亦云的说法，他以此否定严羽《沧浪诗话》的体系，理由是不充分的。“以禅喻诗”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诗话言说方法，严羽的“以禅喻诗”明显是继承了当时流行的比喻方法，江西诗派也常常“以禅喻诗”，但当时运用禅作比喻的人并不都非常精通禅，目的在于借用禅更好地把诗的问题说清楚。严羽“以禅喻诗”这种譬喻方法的运用，比他以前的诗论学者用得更好，更成熟，成了“以禅喻诗”的代表。其中所言说的内容，“是自家实证实悟者”，是他自己个人的心得，而不是说“以禅喻诗”这种方法。严格说来，任何譬喻都是蹩脚的，都是为了形象生动地说明问题，不能滞实地较真。严羽对禅宗所知程度，并不影响他对这种譬喻方法的运用，更不影响他思想的系统性和体系性。况且“以禅喻诗”只是他的譬喻方法的一种，而不是全部，严羽通过这种方法来表述他悟到的心得。钱谦益、冯班、吴乔等人对严羽的质疑，有的是不同观点间的讨论，有的是作进一步的追问，没有否认严羽的做法，而陈继儒、冯班批评严羽喻体不当的冬烘式的嘲讽，实际上是一种本末倒置，不能说明严羽所表达的意思不对。

严羽在禅学知识方面确有不足，但“妙悟说”在受到后人质疑的同时，在矫正江西诗派创作主张的消极影响方面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，并在明清诗学中得以继承和发扬。因此，它的积极影响要大过它的消极影响。钟厚涛据此说是“彻底地否定了”，显然是武断的说法。比喻的不恰当和纰漏，不足

以否认严羽思想的体系性。

尽管钟文一再强调要“最大限度地返回到《沧浪诗话》文本本身”，但在批评严羽“以禅喻诗”的行文中，钟厚涛却是从既定的结论出发，从国内外一些学者对《沧浪诗话》的批评出发，而不是从《沧浪诗话》文本本身出发。实际上，钟文在论述“《沧浪诗话》非体系性”问题时，也是从一些既定的结论出发来看问题的，而没有顾及到古人学说的实际情况。如果一味强调古人学说的“非体系性特征”，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今人之姿态而看轻古人了，是一种“荣今虐古”的做法。

禅与诗之间客观存在着相通之处，“以禅喻诗”是宋代诗歌理论中盛行的方法，对诗歌的体认和鉴赏有着重要的影响，其中严羽对“以禅喻诗”的运用尤其突出，为后世所公认。特别是他的“妙悟”的提出，对诗歌创作机制的探讨有很大的启发，我们不能执片面之词，因为其有争议而将其积极影响完全抹煞。

三 “复古创新”论

复古创新是严羽诗论的一个策略，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基本方法和策略，在文论史上屡见不鲜，《文心雕龙》中就有复古思想，韩愈古文运动也是一种复古创新。而严羽的“以己诗置之古人诗中”肯定不是形式上的相似，而是关乎诗歌本体的兴趣、情味上的相似，这是以典范为标准的做法，并不一定就是完全形似古人。严羽所谓“汉魏尚矣，不假悟也”，实际上是要求学习汉魏真情自然流露的特点，要求回归自然，回到诗性之本然状态。

在严羽生活的时代，江西诗派影响巨大，几乎掌控了整个时代的诗歌创作，江西诗派诗学主张的某些消极面对当时诗歌创作的发展和 innovation 是不利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严羽提出自己的诗学主张，必然会以比较先锋的方式对江西诗派的某些观点进行激烈抨击，并以古人诗作作为自己诗学主张的代言人。这种托古创新的做法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是经常出现的。虽然打着复古的旗号，严羽还是有着自己独立的诗学主张。他的思想中虽然有诸如“吟咏情性”这样体现儒家经典思想的内容，更有着超越儒家思想，体现诗歌艺术自身审美规律的内容。他有意规避诗经与比兴，目的在于想在传统的诗教外另辟蹊径，以图独树一帜，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。因此，我们今天看待严羽的诗学主张，关键是要看它对矫正时弊所起的积极作用，要看它在中国诗学史、文学史上的积极作用，而不能因为严羽继承了一些古人的主张就完全抹杀其贡献。

严羽主张诗要正本清源，要拨乱反正，这种做法本身是没有错的。钟厚涛引述钱振鍠《谪星诗说》中的话：“夫诗岂有一定门户，《风》《雅》-《颂》、汉魏、初盛，门户亦各不同，何必强分其正不正。”钱振鍠列举的都是经典，都是沙里淘金挑出来的，当然没有正不正的问题，但学诗者肯定需要注意，不能误入歧途，这就是正不正的问题。虽然说至法无法，但是我

们不能否定法。严羽所说的古人诗，就是国风、楚辞、汉魏晋和盛唐的优秀传统，他所谓的不正，除了浅薄无知的作品外，就是开元天宝以下的“野狐外道”，他是通过复古来创新。严羽提倡的复古并非要求机械地模拟古诗的形式，而是复兴古人作诗的优良传统，严羽诗论标举“妙悟”，提出“诗之法有五”等，都可看出严羽对诗歌内容的重视，和强调情感的自然抒发。

对于古代文论的研究，要体现出当代性。中国古代文论具有潜在的系统性，今天我们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对中国古代的文论遗产进行归纳和总结，让中国古代文论以相对系统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，在归纳和总结中体现出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，将严羽的诗论思想移到当代性语境中，使其古为今用，为我们建构中国当代的文艺理论体系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。因此，我们既要在宏观上梳理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表现形式、体制特征和发展脉络，又要对具体著作尤其是大量的诗话、词话中的文艺思想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总结。从当代性出发构建古代文论体系不代表不尊重古人的思想，也不代表古人的思想不具有体系性。在研究中体现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与尊重古人思想是不矛盾的。

但钟文把严羽思想说成是“荣古虐今”，显然是不成立的。钟文在第一部分讲严羽“说江西诗病”的时候，只讲继承，第三部分又说严羽批评江西诗派等不当，前后是矛盾的。严羽抨击和批评江西诗派的诗歌，是贯穿在整个《沧浪诗话》中的。退一步讲，严羽对待江西诗派的继承和创新的当与不当，与《沧浪诗话》有无体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。

四 诗话体系论

我们说《沧浪诗话》有体系是有一定参照系的。钱仲联先生曾说：“严羽在继承张戒等人理论的基础上，明白提出了别材别趣、妙悟等一整套理论，对宋诗和宋人诗论作了总结，并提出了学习盛唐以纠正宋人以文为诗的主张……从这里，清楚地看到宋代诗话的理论的针对性。”^[3]这里关于体系有两点强调，一是“一整套理论”，一是这个理论具有“针对性”。黄景进《严羽及其诗论之研究》中则说：“《沧浪诗话》取名为‘诗话’其实是有问题的”，因为此前的诗话用欧阳修的话说是“资闲谈”的，“《沧浪诗话》的议论是置放在一个有体系的架构里，并不是单纯的议论。”^[4]又说“严羽诗论的价值，第一是他综合唐五代至宋的著作形式，提出较有系统的诗论；在宋人诗话传统中，其系统性特色尤为突出。”^[5]强调了严羽理论的体系架构和系统性。钟文所引蔡钟翔和王运熙的说法都明确地说，与宋代诗话如《六一诗话》、《岁寒堂诗话》或《后村诗话》等诗话相比，《沧浪诗话》更有理论体系。

我对《沧浪诗话》体系的说法是“潜在体系”，这样说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参照坐标。这个参照坐标就是严羽以前的诗话著作，我认为与宋代的其他诗话类著作相比，严羽的诗话更具有体系性。《沧浪诗话》包括“诗辨”、

“辨体”、“诗法”、“诗评”、“考证”五个部分，尤其系统总结了前人对诗体、诗法等方面的特点，这是以往诗话所没有的，这就是典型的体系性的表现。不管其观点是否为我们所接受，但其归纳是体系建构性的，是具有体系意识的。钟文认为《沧浪诗话》没有体系，认为自己在还原古人学问的原貌，没有能充分理解严羽思想的内在逻辑。我们有比较地说明严羽《沧浪诗话》有体系，意在按照现代学术形态梳理严羽思想，使其更能为当代学界所接受、继承和发展。

钟厚涛还截引陈寅恪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》中的话批评我为严羽的思想梳理体系，这显然是不当的。陈寅恪的这段话是这样说的：

“然若加以连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，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，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，所居处之环境，所熏染之学说，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。由此之故，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史者，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，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，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。”^[6]这主要是针对“六经注我”的做法的。他批评有些学者写的中国哲学史是自己的哲学观，而不是中国古代的哲学史，涉及到学风问题，与我们从《沧浪诗话》内容出发讨论其思想的情形完全不同。我在文中并没有以今律古，以自己的思想去削足适履，肢解和误读严羽。陈寅恪本人对古代史学的研究，也同样体现了当代性。因此我认为，把陈寅恪这句话断章取义地加在我头上是不合适的。如果从体系视角出发去研究《沧浪诗话》是错的话，那么钟厚涛论文三个部分的“立论动因的消解”、“言说策略的失效”和“批评后效的落空”等标题，则更加符合陈寅恪所批评的“连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”的情形了。

同时，我们对“体系”的认识，需要改变人们对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些固有看法，其实中国古代文论是有体系的或者说古代文论家是有体系意识的，只是可能与西方文论相比，不那么强烈和明显，而这又与古代文论的言说方式、文体特点等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我们对《沧浪诗话》的理论体系虽然以西方理论为参照，并且体现当代意识，但是我们是立足于《沧浪诗话》自身的思想特点进行归纳的，不曲解，不断章取义，不以西方体系对它作简单的改造和移植。

当然，我们不是说严羽说得都是对的，严羽《沧浪诗话》的理论体系肯定不是十全十美的，但是他的错误不代表他没有体系，正如中国的刘勰、德国的康德、黑格尔这样体大思精的人物，他们的思想体系也有很多矛盾之处一样，严羽的思想体系也不例外，也有一些前后矛盾的地方，也有一些核心概念不能贯穿全文等中国古代文论共通的弱点。我们不能因为他的思想有不足之处，就否定他的诗话的体系。当然严羽的理论体系并不象西方近代以来的体系那样谨严和完备，而且我们说严羽《沧浪诗话》有体系是在相对比较意义上的，在宋代诗话尤其显得出色。

总之，钟文对什么是体系没有一个明确、清晰的认识，他以《沧浪诗话》本身的局限和不足来否定其体系性的研究方法是站不住脚的，也是没有-

说服力和可信度的。他的从“立论动因的消解”、“言说策略的失效”和“批评后效的落空”三个维度不能有力论证和顺畅地推导出作者所持有的《沧浪诗话》无体系性的中心观点，中心论点和分论点是脱节的，是“空对空”的，总体逻辑不能自洽和圆融，说明他对理论体系这一概念的内涵还不是很清楚。而体系本身对错与否和这一体系是否存在、有没有体系之间是不能等同的，以一个事物有错误而否定其存在是错误的。这是钟文的根本问题所在。

注释：

[1]朱志荣：《论〈沧浪诗话〉理论体系》，《学术月刊》2009年第2期。

[2]钟厚涛：《〈沧浪诗话〉“体系性”问题再审视——兼向朱志荣教授请教》，《学术月刊》2009年第6期。

[3]钱仲联：《宋代诗话鸟瞰》，见《古代文学理论研究》第三辑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233页。

[4]黄景进：《严羽及其诗论之研究》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48-49页。

[5]黄景进：《严羽及其诗论之研究》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258页。

[6]陈寅恪：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》，见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，第247页。

(作者简介：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，上海200241)